

网络重塑组织

——“青年之声”建设与共青团发展研究

□ 郑长忠 沈大伟 许莞璐 赵晓惠 李心仪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逻辑的嵌入和网络社会的生成，原有的适应工业社会的科层制组织形式，在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都越来越不适应青年的生存交往形态，尤其是基层团组织由于资源禀赋的制约，在组织青年、服务青年等方面面临着多重挑战。“青年之声”作为一个在全团范围内推广的综合性互动社交平台，一方面通过在线服务、线上互动等功能，在增强网上服务能力的同时，使青年在互动中形成同类聚合，另一方面通过线上平台与现有组织架构和工作方式的融合，尤其是与基层团组织的融合，使基层团组织得到了全网资源的支持。以“青年之声”为代表的组织创新，既适应了网络时代青年交往方式的新变化，也适应了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彼此交互的现实，将推动以网络重新塑造团组织，为网络社会中的团组织建设和新型团青关系的构建注入新的动力。当然，“青年之声”毕竟是刚刚推出的一项举措，还有许多内容与做法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与发展。

关键词：网络；“青年之声”；共青团；组织创新

DOI:10.19633/j.cnki.11-2579/d.2018.0176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科层制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组织方式，而中国共青团作为现代政治组织，科层制也就成为其基本形态。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网络社会生成，作为适应工业化的科层制组织形态的不足也逐渐凸显出来，于是，重塑组织形态以适应网络社会，就成为共青团发展的一个战略性命题。“青年之声”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共青团努力的结果之一。“青年之声”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的优势，围绕着青年需求与意见的表达、互动，从一个方面重新定义了“基层”，使共青团组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塑。然而，作为重塑共青团组织形态的重要举措之一，“青年之声”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许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就是对“青年之声”与共青团组织形态重塑之间关系的逻辑以及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的内容进行研究，以期对现实工作提供一些理

论思考与建议。

一、科层制逻辑与现代政治组织： 共青团历史基础

科层制是在工业化社会大生产中应运而生，不仅成为现代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基本组织形态，而且也被现代政治组织广泛应用。在中国，作为党的助手与后备军以及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共青团成为中国现代政治发展逻辑演绎结果之一，也在顺应现代政治与现代社会建设过程中被打上深刻的科层制烙印。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核心与政治组织，其组织的逻辑既与政治使命相适应，也与时代特征相适应。共青团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政治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组织形态与运行方式也同样是政治使命和时代特征为基础而逐渐形成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科层制就成为中国青年团组织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

在此期间，共青团作为现代政治组织其本身所具备的科层制属性，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的计划经济和单位体制的影响，都使得共青团的科层制进一步加强。韦伯认为，科层组织中会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制度化的等级制是科层制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等级化导致了基层资源禀赋不足，还导致组织体系内每一层级的信息传递和汇总成本激增，甚至会出现信息梗阻的情况。就团组织而言，科层制和等级化的组织形态导致基层团组织服务青年的能力下降，进而产生了基层团组织活力不足，以及团组织的行政化、机关化等问题，团组织与青年之间距离逐渐拉大。

一方面，现代政治组织都要求反对官僚主义，从而使组织在满足民众需求、实现自身价值、实行有效管理等方面保持活力；另一方面，在现代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基层组织变得越发重要，因为无论是满足群众的实际需求、提供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还是组织群众、引导群众的任务，都需要基层组织来完成。长期以来，共青团无论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还是群团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两方面的问题而展开。如今，网络社会的生成又使得团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处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中，共青团如何运用网络这一青年的新型聚合方式，打破科层制带来的组织区隔，建立有活力、有动力、有魅力的共青团组织，亟待组织形态的创新予以应对。

二、网络重塑组织与重新定义基层： “青年之声”的创新逻辑

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的嵌入，以及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不仅进入了市场化社会，而且还进入了网络化社会。社会组织形态和青年生活方式的变革要求共青团组织必须做出及时的回应，才能保持团组织的活力和影响力。尤其是对于基层组织而言，单个的、固化的基层团组织由于动员能力和资源禀赋的制约，越来越难以满足网络社会中服务青年、塑造青年的需要。因此，当前共青团与青年关系的构建也应当引入互联网思维，而“青年之声”网络社交

平台就是推动网络社会背景下共青团组织创新的重要实践之一。

1. 网络社会生成与青年生存形态变迁：共青团面临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和青年的生存与交往方式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转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的逻辑逐渐嵌入社会领域，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开始遵循市场的调节而在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流动，原先的“单位制”逐渐解体，青年群体和其他人群一样，从“单位”中的成员转变为原子化的社会成员，再围绕新的生产方式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社会组织网络。其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普及，中国快速进入了网络社会。由工业社会向网络社会的转型对社会组织形态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它在原有的物理社交空间之外又形成了基于网络的虚拟社交空间，这大大增强了原子化的社会成员的个体主体性，并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形成了“自我组织化”的社交方式，这一点在青年群体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作为最早接触到互联网和新媒体的群体，具有更强的意愿和能力参与到“自我组织化”的网络社交中。

网络社会的生成与青年生存形态的新变化使共青团原有的科层制组织方式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首先，基于行政区划和“单位制”的科层制组织管理方式越来越难以应对人员自由流动的现实，尤其是对于共青团的基层组织而言，“找不到青年、抓不住青年”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次，科层制下的基层团组织由于资源禀赋的制约，越来越难以满足原子化的个体青年的多方面需求，这势必导致服务能力和组织聚合能力的下降，从而导致共青团组织无法充分发挥引导青年的政治功能和服务青年的治理功能。最后，网络社会所形成的网络虚拟空间也需要团组织的嵌入，青年对网络空间的依赖和网络空间对青年的影响都日益增强，网络空间中的团组织建设也愈加重要；团组织只有结合了青年在网络空间中的社交方式，才能实现青年的聚合。

为应对网络社会带来的挑战，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也都采取过不少积极的举措，包括建立门户网站、开通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等，但这些网络平台都主要以信息传递为主，尚未充分结合青年在网络中的交往方式，也没有完全融入团组织动员青年、塑造青年的整体工作体系中。

2. 网络重塑组织与新型团青关系构建：“青年之声”的组织逻辑

2015年7月，团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全团推进“青年之声”互动社交平台建设的通知》，“青年之声”成为共青团在网络社会中实现组织创新的重要实践载体^[1]。“青年之声”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网上交互平台，从而应对网络社会生成给现有的团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带来的挑战，实现网络重塑组织和新型团青关系的构建。

首先，“青年之声”以服务青年为首要目标，通过价值引导和互动平台的建立实现在网络空间中重新聚合青年。要增强团组织的吸引力，固然要通过适当的组织方式，但关键还是在于能否满足青年的多方面需要，其中既包括在学习成长、就业创业过程中的现实需要，也包括通过社交寻求共同兴趣爱好和情感认同的需要。因此，“青年之声”不再将重点置于信息发布，而是以服务青年为首要目标，通过在线问答功能，吸引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尤其是针对青年群体的学习就业、创业创新等现实需求，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都可以接入这一平台，为青年群体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服务平台。同时，“青年之声”又是一个互动社交平台，包括青年参与者之间的互动、青年与后台团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青年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在线互动。在聚合青年的基础上，“青年之声”得以通过宣传引导积累正能量，增强互动社交平台的组织内聚力。

其次，“青年之声”通过与共青团现有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方式相融合，促进了“复合型”团组织的建设。在线上互动中，“青年之声”可以促使具有共同职业、兴趣等特点的青年聚集起来，并集中回应这些特定群体的需求。同时，互动社交的信息又形成了青年参与网络空间的大数据，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持。此外，后台团组织既可以直接通过线上平台与青年参与者互动，也可以通过实体性团组织在物理空间内联系特定青年群体，使得团组织在整体上具有更高的工作效益，实现通过网络重新塑造团组织和团青关系。

3. 网络重新定义基层与共青团深化改革：“青年之声”的运行机理

如前所述，在工业社会向网络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基层团组织由于资源禀赋的制约，一方面难以应对由于人员流动带来的物理空间内的组织困难，另一方面也越来越难以满足青年多方面的需求，尤其难以满足不同特点的青年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而“青年之

声”则通过网络实现新的群体性聚集，即青年在互动中形成的基于不同群体特点的聚集，从而团组织可以在宏观层面上重新整合资源，使得基层团组织不再是单一的、相对独立的行动主体。

“青年之声”的出现，使网络重新定义了共青团的基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青年之声”的运行使每一个基层团组织真正成为整体团组织的一个端口。“青年之声”是在全团范围内推进的互动社交平台，以往各级团组织建立的各类网站和新媒体平台依然是科层制组织形态在网络空间内的延伸，依然只是服务于特定的青年群体，尤其是按照行政区划切分的青年群体，而“青年之声”则能实现整体青年群体的同类聚合，从而以全网的资源解决基层团组织的实际问题。二是在团青互动方面，“青年之声”为个体青年提供了一种意见表达、民主协商、多元参与的新渠道，互动信息形成的大数据又可以作为决策的依据，从而帮助基层团组织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基层是团组织面向团员的窗口，其工作能力直接决定着团青关系的紧密程度，而通过网络重新定义基层，使基层团组织具有了更强的服务青年、塑造青年的能力，既有助于克服资源禀赋的制约，也有助于克服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问题。

三、组织重塑逻辑与双重空间中的组织发展：“青年之声”的功能定位

作为现代政治组织，科层制也成为共青团的基本组织形态，而网络社会下，青年生存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的组织形态已难以适应，亟待变革。在此背景下，“青年之声”作为组织重塑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开创了网上共青团的工作格局，一方面强化了网下共青团的实体建设，成为共青团全面深化改革重要内容之一。

1. 在政治与治理之间：“青年之声”的双重功能

共青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同样拥有政治和治理这两方面功能。政治功能，一方面是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思政工作、政策宣传等上情下达的内容，另一方面是由下往上的青年利益表达、利益协商。治理功能，则是要求共青团服务青年和青年所在的共同体，让青年在其共同体中发挥作用，同时整合不同青年群体之间的需求。由此可见，政治功能和治理功能相辅相

成,政治功能寓于治理功能之中,治理功能体现政治功能,二者共同统一于共青团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

“青年之声”作为新型互动社交平台,顺应了网络时代对共青团改革的呼声,使共青团在政治和治理两方面功能可以得到有效开发。“青年之声”使青年可以通过网络发声,并真正做到信息不拖拉、不过滤、不回避、不设障地垂直输入团中央,不会因为传统科层制的屏蔽使青年变成“沉默的大多数”,“青年之声”便可真正成为青年的声音。同时,在做到对青年需求有求必应的基础上,还能将团中央声音直达基层,并在青年群体之间快速引爆,通过前期的服务基础,贴近青年、团结青年、引导青年、赢得青年,最终实现在网络社会背景下保持并增强团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此外,“青年之声”还将借助大数据的优势,对青年群体进行划分,通过后台的实时开放,对青年在线反馈的声音进行数据监控,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形成青年思想动态舆情分析专报,为制定整个青年领域的政策,提供公共决策的依据。

“青年之声”还担负着共青团服务青年的重任。其一,通过全方位覆盖青年成长的必需项,“网住”最大多数青年,满足其基本利益需求;其二,通过线上线下开展针对青年学习生活的活动,满足其群体之间差异性的需求,有利于青年身心健康发展;其三,通过“青年之声”在共青团全网的有效整合,满足青年在本单位中发挥作用的渴求,提高其服务本团体的能力,解决了青年共同体之间的内部治理;其四,通过“青年之声”的多元化网络社交平台,使不同青年主体间加强了相互联系及交流,推动青年之间跨地域、跨领域的复合相互依存形态的生成。

“互联网+共青团”的工作格局,是将“青年之声”线上平台与“青年之家”等线下服务阵地深度融合,与共青团日常工作紧密对接,把共青团各项工作和活动融入“青年之声”链条,把团干的工作思维理念、方式方法推向互联网时代,为普惠青年创造最大环境。

2. “青年之声”与网上共青团建设:共青团功能实现的网络空间组织基础

“青年之声”互动社交平台,是面向全团的统一网络系统,承载着团组织与各界青年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的重要使命。目前平台由信息发布、留言审核、综合办公管理和调查统计四大系统组成,下设青春朗朗、回声嘹亮、面对面、微观察、同声同心、活动公告等六大栏目,聚焦青年声音,把青年留言、团中央

回复、专家深入交流、实时调研分析、活动推送有机统一,成为串联起领导、团干、专家、青年的主线。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青年能力,做到回复的专业、有效、有针对性,“青年之声”还筹建了八大服务联盟,覆盖与青年切实相关的成长、创业、公益、维权、婚恋、心理、健康等核心领域。“青年之声”建构了一个连接全国的有机组织形态网络,为新时期网上共青团建设奠定了基础。

“青年之声”的创立,为网上共青团更好地发挥政治功能提供了组织基础。“青年之声”积极适应青年的交往方式,通过网络社交平台的建立,在聚拢青年的同时进行思想引导和新闻宣传,激发了青年参与线上交流的热情。例如贵州在举办贵阳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之际,借助“青年之声”广泛调动青年参与。通过“青年之声·六盘水”互动社交平台发布“青年与生态”征文公告,探讨青年与生态、扶贫、改革的关系,研究资源型城市的快速可持续发展和农村扶贫精准化问题。论坛当天,“青年之声”平台进行了图文直播,吸引了大批青年的关注和参与,青年声音得到了整合,也将汇总成为制订生态扶贫政策的坚实参考依据。

“青年之声”的创立,也为网上共青团更好地发挥治理功能提供了组织基础。由于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青年工作的格局,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资讯都能接入“青年之声”平台,这大大增强了网上共青团服务青年的能力,也增强了团组织的吸引力。例如中铁集团启动“青年创新创效百人攻坚组”活动,集中攻关国家重点铁路建设难点。在“青年之声”的推广下,中铁集团建立了参与该活动的微邦组织群,将原先分散在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中的青年攻坚组成员会聚起来,大大提高了成员之间的沟通效率,网上共青团的服务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3. “青年之声”与网下共青团改造:共青团功能实现的物理空间组织基础

“青年之声”的平台建设,改造了网下共青团的整体组织框架。传统共青团建设,在科层制的机制下,部门间各自为政,区隔严重。“青年之声”的建设,打破了原有的屏蔽,使得共青团作为一个整体,以平台性的工作融合青年声音。此外,各地团组织也不再囿于本地团建,而是与全国各级各机构团组织相互关联,从而团组织得以作为一个整体服务于各基层单位。基层作为共青团的端口和重要一环,是组织的神经末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过去,基层资源

禀赋不足，上层资源惠及不到最底端，基层要想获得资源，一方面靠自己争取，一方面只能依靠上级的供给，时常带来精准性缺乏和滞后性严重的问题。同时，资源处在相对固定模式，难以跨域流动，为满足青年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带来难度。通过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团内资源，“青年之声”的互动平台让游离在团组织之外的社会力量面向基层“进网入格”，改变了传统工作模式的低效局面。

“青年之声”平台，为线下共青团发挥政治功能的表达创造了新的条件。青年的需求是组织关注的重点，青年的声音也该直达组织的核心。依托“青年之声”的平台，使青年的诉求得以表达，得到倾听，也帮助基层团组织增强了吸引力和影响力。例如浙江省灵岩古庄园是一座百年老宅院，有青年创客想用“互联网+旅游”的发展模式打造乡村旅游品牌，通过“青年之声”平台，创客团队表达了希望得到地方政府支持的意愿，浙江省团组织了解到这一情况，主动帮助青年创客团队与当地政府签订旅游发展战略协议。可见，网上共青团的建设不是对网下共青团的否定，通过组织创新的方式改造了团组织在传统物理空间内的工作模式，使实体的团组织真正成为青年的引导者和代言人。

“青年之声”平台，为线下共青团凝聚服务青年的治理需求提供了新的可能。例如南开大学在开学伊始，推出了“青年之声”迎新专区，通过分析新生在网上的提问和讨论，学校团组织得以设计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和活动内容，让青年从步入校园起就围绕在团组织周围。在此基础上，该校的“青年之声”平台又将服务范围从入学阶段的新生延伸至即将离校的毕业生，通过学生在网上互动中形成的同类聚合效应，线下团组织可以准确地“抓住”各类学生群体，从而更加有效地利用组织资源。

“青年之声”是共青团整体组织体系中的一部分，它通过发挥网上组织平台的优势，建构起青年对组织的身份认同。通过网上和网下团组织的衔接，不仅促使共青团作为一个整体更好地发挥了政治功能和治理功能，也在引领网络社会背景下共青团的组织创新。

四、在重新定义基层过程中重塑共青团组织：“青年之声”的发展空间

尽管身处网络社会中的青年群体越来越依赖于网

络空间中的互动社交，但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仍然是同等重要的，二者的交互关系决定了“青年之声”的发展必须与共青团现有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方式相融合，即团中央提出的“四个融合”，尤其是与基层团组织的融合。

1. 走向“合题”的共青团：“青年之声”与网络时代共青团组织形态生成

团中央“青年之声”平台以互动社交作为其主要业务，通过向试点省份的省级团委、地市级和县级团委、基层团组织依次推进，实现对各领域青年的广泛覆盖。作为社交平台的“青年之声”主要强调信息资源问答，使各级团组织结合自身实际和各类青年需求不断完善服务能力。在提高自身工作效能的同时，加强建构网络组织形态，建设高效有序的运行机制，将不同领域青年的声音纳入团组织的工作体系，使“青年之声”成为各界青年多元融合的平台，这是改造共青团组织，力争将组织形态发展推向“合题”的重大尝试。

在这样的尝试中，为打造多元融合的平台，必须重视基层团组织的建设。超越工业化时代的组织形态，需要将网络时代组织发展与工业化时代的组织形态进行融合，而两者的“合题”离不开基层团组织的发展。基层团组织是联系青年的直接桥梁，上级共青团组织可以通过网络向基层团组织提供有效的政治资源，也可以吸收来自基层的青年的不同的声音，更好地服务各界青年，让共青团组织更加具有凝聚力与吸引力。

2. 实现“四个融合”与网络时代共青团组织形态生成：“青年之声”的方向

为打造更加高效、服务、具有吸引力的青年平台，必须实现“四个融合”，即实现“青年之声”与共青团工作全面融合，实现“青年之声”与“青年之家”全面融合，实现团内团外全面融合，实现机关和基层全面融合。“四个融合”的主要内容体现了网络化时代共青团组织与各界青年全面融合，各级共青团组织间有效互动。

秦宜智同志也在团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推进“青年之声”“四个融合”工作，关系到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关系团的工作有效覆盖面，关系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2]。它强调的不仅是共青团中某部门与网络时代逻辑的融合，而且是纵向结构的各级共青团组织在网络中拉近距离，缩小资源差距的整体融合，是共青团内外各界青年的多元融合。这种全方位的融合

涵盖了共青团组织的政治功能与治理功能。网络时代的共青团组织不仅承担着自上而下的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功能，而且也提供了青年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通道。但是，从“四个融合”中可以发现，网络化时代的共青团组织并不仅限于其传统的政治功能，还通过多部门合作，逐步实现其治理功能，满足各界青年多元化的需求。治理功能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共青团组织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为构建多元的、服务的网络共青团组织提供强大推动力。

3. 坚持多赢原则与实现“四个融合”：“青年之声”发展的着力点

“合题”与“四个融合”为网络共青团组织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方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贯彻理论与实践指导必须找准“青年之声”发展的着力点，坚持多赢原则。“青年之声”的功能不仅在于单纯的知识问答与信息搜集，还承载着对重塑共青团组织形态的功能。因此，“青年之声”下一步发展必须将两方面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即网络社区建设逻辑与共青团组织形态重塑逻辑。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增益。共青团组织可以通过物理空间的现实组织为网络社区建设服务，同时，网络社区建设也可以为现实组织发展提供有效的帮助。

在践行“四个融合”的过程中，有以下四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对现实组织进行动员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双赢的逻辑，而非利用行政化方式进行任务分派，这是运用网络社会逻辑改造现实组织的重要一环。网络社会呈现扁平化的、多点连接的特点，这能够极大地帮助共青团组织实现各级团组织之间的联络互助，遵循网络社会的逻辑解决不同层级间各共青团组织的资源禀赋差异。二是，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甚至人工智能手段实现信息整合与资源调配。现代信息技术能够有效帮助共青团组织积极吸取青年意见，时刻了解青年心声，整合不同群体的青年诉求，为共青团组织决策提供有力的民意参考。另外，网络化时代共青团组织应当善于充分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提高各级团组织间资源流通能力，统筹不同层级共青团组织资源差异。三是，建设“青年之声”既要利用共青团自我建设的网站数据，还要充分利用开放性社会网络数据，实现在开放条件下推进“青年之声”建设与共青团组织形态重塑。来自社会与市场的网络数据能够扩展共青团组织包容的面向，为“青年之声”提供更多信息数据，帮助共青团组织积极解决青年问题，

为共青团组织建设更加完备的数据收集系统，完善共青团组织的内部建设。四是，全团都要有意识将“青年之声”建设与群团改革以及组织重塑结合起来。通过重新定义基层，改善基层资源禀赋，以及重新定义共青团服务青年方式，建设共青团自身主体性，强化能动性，倾听青年心声，发动各级团组织解决青年问题，在赢得青年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共青团组织的政治使命。

五、结 论

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共青团通过建立完备的基层组织和科层制组织体系，实现了对青年群体的组织与塑造，使青年成为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力量。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逻辑的嵌入和网络社会的生成，原有的适应工业社会的科层制组织形式，在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都越来越不适应青年的生存交往形态，尤其是基层团组织由于资源禀赋的制约，在组织青年、服务青年等方面面临着多重挑战。“青年之声”作为一个在全团范围内推广的综合性互动社交平台，一方面通过在线服务、线上互动等功能，在增强网上服务能力的同时，使青年在互动中形成同类聚合，另一方面通过线上平台与现有组织架构和工作方式的融合，尤其是与基层团组织的融合，使基层团组织得到了全网资源的支持。以“青年之声”为代表的组织创新，既适应了网络时代青年交往方式的新变化，也适应了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彼此交互的现实，将推动以网络重新塑造团组织，为网络社会中的团组织建设和新型团青关系的构建注入新的动力。当然，“青年之声”毕竟是新推出的一项举措，还有许多内容与做法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与发展。■

郑长忠：全国共青团青年工作研究基地主任，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沈大伟：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许莞璐：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
办公室副主任
赵晓惠：复旦大学团委副秘书长
李心仪：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责任编辑/王珑玲

(下转第34页)

有理论直接解释。

四、讨论与不足

在中国，也有学者提到与初显成人期相似的概念。费孝通的《生育制度》曾将社会结构划分为“中心结构”与“预备机构”两个部分。中心结构的功能是“分工合作以谋维持社会生存”，预备机构作为中心结构的附属外围则是“配置社会分子”。预备机构中的候补员等待合适的机会加入中心结构中，需要注意的是，预备机构的“容量伸缩相当大”，候补员“候补时期的长短并不一致”^[19]。

费孝通的“候补员”与阿奈特关注的初显成人期群体不谋而合。“……平均寿命的拉长，退休年龄的改迟，候补者授实的机会减少，在预备机构中等候的人数也就增加了”，这也是为何初显成人期群体开始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费孝通是在论述整个生育制度时提到这个群体，阿奈特则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展研究并发展出初显成人期理论。而本文试图将中国的生育问题与初显成人期理论进行连接，探求中国

女性婚后的初显成人期。

生育对于女性来说，是终结初显成人期的节点。经济水平的提高，对生育条件的要求也会更高。女性从文化、经济、个体发展需求来综合考虑决定生育行为的开展。同时生育也是关乎“社会继替”的问题。平均寿命的增长、延长退休年龄意味着社会更替速度变慢，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限制人口看似是一种方式。然而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不能维持社会继续进步的要求，这又需要青年人对生育保持一定热情。面对这样矛盾的现实，阿奈特初显成人期概念引导我们关注育龄女性，并将其置身于更为宏大的社会背景下，为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群体提供了一种分析范式。本研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由于数据中90后的结婚率较低，删节情况严重无法进行代际横向对比，缺少合适的变量来讨论经济因素的影响等，今后的研究会继续向这一方面努力。■

池静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博士生
何汝勤：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陈晨

参考文献：

- [1] [2] [6] [7] [10] [11] Jeffrey Jensen Arnett. 长大成人[M]. 段鑫星, 等,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129, 18, 25, 227, 3, 11.
- [3] [19] 费孝通. 生育制度[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05: 138.
- [4] 王宁. “准成人期”: 青年研究的新范式[J]. 青年探索, 2018(1): 51-61.
- [5] Juan Zhong & Jeffrey J. Arnett, Conceptions of adulthood among migrant women workers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014, Vol. 38 (3) 255-265.
- [8] 李峰. 宗教信仰影响生育意愿吗? ——基于 CGSS2010 年数据的分析[J]. 世界宗教研究, 2017(3): 18-34.
- [9] 李玉柱, 姜玉. 80 年代以来我国妇女初婚初育间隔变动分析[J]. 西北人口, 2009, 30(3): 53-56.
- [12] 高颖, 吴昊. 人口流迁对北京市平均初婚年龄的影响[J]. 人口研究, 2012, 36(5): 58-68.
- [13] 曾迪洋.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劳动力迁移对初婚年龄的影响[J]. 社会, 2014, 34(5): 105-126.
- [14] 郑真真. 外出经历对农村妇女初婚年龄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02(2): 61-65.
- [15] 王鹏, 吴愈晓. 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CGSS2006 的研究[J]. 社会, 2013, 33(3): 89-110.
- [16] 刘爽, 高华. 我国人口初婚风险影响因素及其变迁——基于 CGSS2010 的研究[J]. 南方人口, 2015, 30(1): 1-14, 46.
- [17] [18] 杜本峰. 事件史分析及其应用.[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5-8, 126-128.

(上接第 55 页)

参考文献：

- [1] 团中央办公厅. 关于在全国推进“青年之声”互动社交平台建设的通知[C]. 2015-7.
- [2] 秦宜智. 在团十七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EB/OL]. 中国青年网, 2016-1-18.